

# 异域想象“幻灭期”的族际冲突、心理应激 与国际政治意蕴

——以美国大众文学形象“东乡桥村”为个案的研究\*

张小龙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叶至二战结束的近百年时间内,日本在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西方观察者笔下至善至美的“东方世外桃源”梦幻形象自20世纪初开始逐渐瓦解,让位于对日本国家和国民的一系列负面认知,最终使日本国家形象全面恶化。这一持续20余年的时间段可称为西方对日异域想象的“幻灭期”。美国大众文学作家欧文在此期间创作了广受欢迎的“东乡桥村”系列连载作品。日本旅美学童“东乡桥村”的形象既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日本移民群体的族群特征,也透射出主流文化族群试图对日本异域想象进行救赎的主观努力。“东乡桥村”形象的出现,从侧面证明近代以来西方视野中的中日国家形象长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态势。认识并化解这一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隐秘政治逻辑”,对于新世纪的中国国族形象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异域想象 幻灭期 族际冲突 东乡桥村

东乡桥村(Hashimura Togo)是20世纪初美国大众文学作家华莱士·欧文(Wallace Irwin, 1875—1959)在书信体小说中创造的日本侨民形象。1907年11月,正值美国排日浪潮高涨期间,纽约的《科利尔》(*Collier's*)周刊突然刊登了一篇署名“东乡桥村”的“日本学童来信”,信中诉说了这位35岁旅美“学童”在旧金山种族骚乱中遭遇的暴行,其行文虽极尽舞文弄墨之能事,但无奈文法半通不通,思维更是与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错进错出间制造了无数笑料。此后“东乡桥村”的来信又接连刊出,以日本侨民的视角讲述在美国土地上的见闻,纵论社会新闻,歪批热门时事,尽情发挥“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风格,令人忍俊不禁,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信件的真实作者华莱士·欧文和他创造的“日本学童”不久即声名鹊起,《纽约时报》与《美国》杂志竞相连载该系列。马克·吐温更是致信《科利尔》编辑部称:“这位学童是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文学作品中最可亲、最甜美、最坦诚、最聪明、最滑稽、最令人开心、最讨人喜爱的形象,我认为他将会是不朽的,希望如此。”<sup>①</sup>

借着高涨的人气,欧文于1909年结集出版了第一部“东乡桥村”系列作品,题为《日本学童的来信》(*Letters of a Japanese Schoolboy*),此后又连续推出了3部作品集,分别是《全能女仆东乡先生》(*Mr. Togo: Maid of All Work*, 1913)、《家务学家东乡桥村》(*Hashimura Togo: Domestic Scientist*,

\* 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Yoshiko Uzawa, “‘Will White Man and Yellow Man Ever Mix?’: Wallace Irwin, Hashimura Togo, and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America”, in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7 (2006), pp. 202–203.

1914)、《日本学童的更多来信》(*More Letters of a Japanese Schoolboy*, 1923),其间好莱坞拍摄的《东乡桥村》影片还于1917年上映,“东乡桥村”在20世纪初的美国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日本人代名词,马克·吐温的预言貌似大有实现之势。然而,东乡桥村的人气自20年代起开始下滑,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完全跌入谷底,几乎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

20世纪70年代,“东乡桥村”系列重新进入批评者的视野。<sup>①</sup>对东乡形象的再发现,无疑为揭示白人种族主义视角下的文明观照机制提供了鲜活的研究范例。在西方眼中,古朴、优雅、梦幻的中国镜像早在18世纪后期即已逐步瓦解破碎,而日本则将类似形象成功地维系至20世纪初日本移民大举登陆美国之际。与日本移民的近距离接触,意味着西方对日异域想象幻灭的开端,进入20年代后,日本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正面印象为负面印象严重侵蚀,完成了幻灭的过程。梳理美国主流文化族群通过“东乡桥村”形象对日本异域想象的救赎尝试及其失败历程,有助于从社会史的视角还原二战前美日国家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前夕的民众心理流变,从中窥见异域想象因素在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 一、东乡桥村:日本“祛魅”过程的具象物

研究者指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美国同时并存迷日(Japanophilia)和仇日(Japanophobia)两种社会现象。<sup>②</sup>但相对于晚近形成的“仇日”心态而言,“迷日”现象并非新潮流,只不过是日本在19世纪西方人士心目中“世外桃源”或“东方梦幻之地”形象的延续而已。一边是西方媒体竞相为“黄祸”论张目,另一边则有众多英美作者留下了对日本优美风光和前现代异国情调推崇到极致的文字。英国作家沃特森于1907年对日本传统风情进行了近乎狂热的礼赞:

一部旨在揭示现代日本心理特征的著作,既要留意到日本七彩纷呈的一面——遍地樱花疑从仙苑移栽的日本,金苹果乐园般的日本,从朝晖夕阴到正午艳阳变化万千,犹如仙女信手勾画天界景色的日本;也要留意到日本是一幅现实中的生动图画,而不是浪漫却已逝的过往。日本在人们的心目中应当是一座中途驿站,路途的一端通向至福之岛,另一端坐落着我们平庸的英国,它与日本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另一个日本——它是极乐之国,对心理学一无所知!它生就一派福相,对历史的本质从不追问!它常存天真之念,对自然现象绝不探究!它对一切谜团毫无好奇心,沉静愉快地敬而远之!<sup>③</sup>

而在大洋的彼端,来自“极乐之国”的劳工此时正以每年数以万计的数量涌入美国西海岸。据日本西北太平洋协会于1907年进行的统计,仅1906年就有13835名日本人进入美国。<sup>④</sup>从东乡桥村寄给报刊编辑的众多信件来看,自称“学童”的东乡抵美后并未就读过任何学校,而是不久即汇

<sup>①</sup> 赵健秀(Frank Chin)、金惠经(Elaine H. Kim)等知名美国亚裔文学批评家均注意到“东乡桥村”系列作品,但仅将其作为种族主义作家夸大“亚洲移民喜剧化语言效果”的范例之一,并未对其人物形象进行深入发掘。参见 Frank Chin, Jeffery Paul Chan, Lawson Fusao Inada, Shawn Hsu Wong (eds.), *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Washington: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x-xi; 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3. 关于该系列作品,目前国内仅见的专题探讨是日本学者宇泽美子(Yoshiko Uzawa)进行的系统整理性研究(宇泽美子『ハシムラ東郷:イエローフェイスのアメリカ異人伝』,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以及她的数篇英文论文。

<sup>②</sup> 王增红:《种族冒充、冒充叙事与混血族身份政治——温妮弗雷德·伊顿新解》,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sup>③</sup> W. Petrie Watson, *The Future of Japan, with a Survey of Present Conditions*, London: Duckworth and CO., 1907, p. viii.

<sup>④</sup> *Japanese Immigration: An Exposition of Its Real Status*, Seattle: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acific Southwest, 1907, p. 5.

人家政服务大军的洪流中,这也是旅美日本人此时最普遍的谋生手段之一。东乡自嘲“我来到北美,接受的是洗盘子、扫地等家务专业的高等教育,我希望尽可能地学到一切,但这通常是不可能的。”<sup>①</sup>与美国社会、美国家庭的痛苦接触,以及永远以惹祸被炒告终的家政服务经历,即是他惨不忍睹的学习过程,东乡的信件无疑可被视为初代日本移民学习适应西方文明的尴尬成绩单。尽管如此,东乡仍倾心向往融入美国文明,并以个性化的提问方式(I ask to know)<sup>②</sup>频频提出令美国人感到幼稚可笑的问题而不自知。从美国两党的政治角逐到华尔街的股市,从莱特兄弟的飞机到天文学家新发现的火星“运河”,都是东乡追问不已的新奇事物。本应作为被观照客体的日本民族竟然主动寻求空间和场所上的易位,实现了观照过程的主客反转,证明“对一切谜团毫无好奇心”的“另一个日本”在现实中已宣告终结。

世纪之交的日本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欧美国家的文明进程,而西方却越来越多地将溢美之词献给几乎已成昨日遗迹的“另一个日本”。<sup>③</sup>与其说这是日本国家之福,不如说预示着日本国家形象的潜在危机。在萨义德看来,“作为众所瞻望的圣地”的东方和“作为一种场景或者活的静态画面”的东方,是西方观察者笔下一直在同时出现的母题。<sup>④</sup>然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西化开放取向正是一场“祛魅”的过程,古老东方的神秘性不断淡出现代生活,“圣地”形象难以为继,“活的静态画面”也已被移俗易服、出洋求学的现实生动图画所取代。而日本一旦停止扮演“极乐之国”的角色,不愿再成为“东方橱窗”中精致的展品,满足西方人的异域想象,其形象魅力就大打折扣,日本“祛魅”的过程亦即西方“幻灭”的过程。

在现代化“硬实力”与传统文化“软实力”如何取舍的两难困境中,日本选择了前者。受日本官方派遣向欧美发声的特使末松谦澄解释说:“我们经常被告知:日本的古老风俗礼制如果照此速度流失下去,人们就再难把日本视为一件世界艺术珍品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为了取悦环球观光客就打断发展,束缚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脚步。那将是无法承受的损失。”<sup>⑤</sup>倾心西化的明治精英一代并未意识到,这一选择既打破了东西方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文明秩序高下之分,也意味着西方向东方寻求最后“精神避难所”的努力宣告彻底失落。从16世纪开始,西方观察者就致力于寻找日本文明相对西方的种种相反与倒错之处,日本时常被定义为与西方恰好形成“倒置”(topsy-turvy)关系的另一极。<sup>⑥</sup>19世纪中期西方重新打开日本国门后,“倒置”关系进一步具有了道德比较上的意义,日本在物质上的古朴原始与精神上的宁静和谐都与备受文明弊病困扰的西方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为西方所可望而不可即。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及其国民在既有的时空阙限内继续维持原生态面貌,是得到西方珍爱的前提条件。

“祛魅”概念在西方社会学界的提出,本身即是对“现代文明”名义下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批判与反思,与19世纪末西方的文化怀旧情感互为表里。但在“日本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日本对现代性的追逐与西方对前现代性的怀恋恰如相向而行的列车,在短暂的交会后渐行渐远。舍勒特

① Wallace Irwin, *More Letters of a Japanese Schoolboy*,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23, p. 3.

② 在“东乡桥村”系列中,“I ask to know”是东乡标志性的个性化语言之一,仅《日本学童的来信》中即出现15次。

③ 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无疑是这一时期从事“传统日本”怀旧书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此外,影响力较大的作品有弗兰克·林德(Frank Rinder)的《旧世界日本》(*Old-World Japan*, 1895)、雷吉纳尔德·法雷尔(Reginald J. Farrer)的《亚洲花园》(*The Garden of Asia*, 1904)、乔·利特纳(Geo H. Rittner)的《日本印象》(*Impressions of Japan*, 1904)、D. C. 安格斯(D. C. Angus)的《东方仙境日本》(*Japan: The Eastern Wonderland*, 1905)等。

④ [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04页。

⑤ Baron Suyematsu, *The Risen Su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05, p. 132.

⑥ 16世纪旅日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关于日欧风土人情的比较记录,可谓“倒置”观照模式的滥觞。(见[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范勇、张思齐译:《日欧比较文化》,商务印书馆,1992年)。类似的观照模式当然也广泛存在于中西比较之中,但由于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的“幻灭”早在19世纪中期日本开国前已然发生,日本才得以独自占据精神上的高地。

别指出:日本的某些阶层正在“竭尽全力去掌握欧洲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认为“现代科学的进步”将为他们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然而,这不过是欧洲知识阶层“大约一个世纪前所相信的东西”,在日本等后起文明国家,谁对民众的狂热欧化劲头报以“讽刺的微笑”,新生代文化精英代表的“新的、更高贵的欧洲”就会和谁站在一起。<sup>①</sup>

“祛魅”过程对日本的国家形象而言无异于一把双刃剑,西方由日本“祛魅”引发的幻灭感和失望之情,也无疑要由东乡桥村们来承受。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在对吉卜林作品的评论中写道:“用英语和孟加拉语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穿着长大衣的戏剧化的土著”是对秩序和浪漫故事的威胁,因而受到无休止的讽刺。<sup>②</sup>对于操着洋泾浜英语大谈美国政治经济问题,并且声称“日本绅士的礼帽、美式西装裤和礼服大衣已经使他的肤色完全变白”<sup>③</sup>的东乡桥村,西方人的观感同样是复杂的。日本坚决而拒绝妥协的西化进程,使得西方不得不以“现代文明国家”而非“前现代东方国家”的标准去衡量日本及其国民,尚未来得及修正的弱点被迅速放大开来,西方对日本的观察视角随之发生了由“仰望”到“俯就”的转变。

而一旦涉及如何对待“工具理性”的问题,东乡桥村就与深受现代文明痼疾困扰的西方知识阶层发生了更大的冲突,处处体现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文明价值判断上的滞后性和混乱性。这足以使他作为日本“祛魅”过程的具象物,遭到美国人的嘲笑。试看东乡在寄给编辑的第一封信件中是如何自报家门的:

杰出的白人诸君必会发问:日本学童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呢?本人以自己的话,兹列举若干目的如下:

1. 来学习宗教、簿记与速记法。
2. 来巩固两国友谊、经营百货商店。
3. 来参加赛马。
4. 来学习美国礼仪。
5. 来学习星期日报纸上的风俗、凶杀、艺术、科学和幽默文学。
6. 来返回日本。<sup>④</sup>

东乡的文风具有鲜明的“簿记化”特色,动辄不分主次地进行流水账式的列举归纳。开列账单并炫耀自作聪明的精打细算,也是东乡的一大爱好。但东乡不可能预料到,“数目字化的管理”作为工具理性的主要特征,此时正被西方知识界视为“祛魅”的负面效应而诟病不已。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表述是:“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sup>⑤</sup>德国浪漫派诗人格奥尔格进一步指出,人类的计算能力虽得到了空前发展,但这却是以牺牲“所有的尊贵和美”为代价的。<sup>⑥</sup>专业化和理智化的力量得到空前发展,一切貌似都可以在“科学”的名义下得到合理统筹和解决,甚至连家务活都获得了“家务科学”(domestic science)的名目。<sup>⑦</sup>西方新生代文化精英怀恋着信仰与理性相统一的时代,而他们的怀旧情结却完全无法被一心渴求西化的日本新移民理解。美国移民局公布的西海岸移民调查报告称,日本移民“十分急切地渴望学习西式方法,并至少从外在层面上顺应他们所处的文明”,尤其

① [德] 马克思·舍勒著,罗悌伦等译:《资本主义的未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0—82页。

② [英] V. S. 奈保尔著,张敏译:《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第193页。

③④ Wallace Irwin, *Letters of a Japanese Schoolboy*,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09, p. 22, 7.

⑤⑥ [德] 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9、3页。

⑦ Wallace Irwin, *Hashimura Togo: Domestic Scientist*, New York: 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 Co., 1914, p. 7.

“在服饰和一切表面事物上”无不遵从美国社会。<sup>①</sup> 东乡置现代管理科学的合理内核于不顾,徒然将“簿记与速记法”奉若神明,难免不被讥为买椟还珠的可笑愚行。

更令人惊骇之处在于,东乡在这里赫然使用了“学习宗教”(learn religion)这一令基督徒闻之色变的说法,仿佛宗教信仰并非生命的终极寄托,而是和“簿记与速记法”一样可以习得的技能!在东乡的精神世界中,基督信仰竟是完全工具化的存在,如果“簿记与速记法”被他视为构成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要件,那么基督教亦然,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东乡不时去教堂做礼拜,但这仅仅是“学习”而非真正的皈依,学会一整套基督宗教仪式的目的,与学会美国礼仪、懂得赛马规则、通晓现代工商业记账方式的目的是是一致的,即以此证明自己已成为可被文明社会接受的一分子,赢得美国人的“友谊”,在美国土地上实现成为杂货店主的理想。既然连精神信仰都能被降格到生存工具的程度,那么东乡自然也不可能了解美国文明的真正意义所在,他惯于将崇高事业与市井生活、科学艺术与黄色新闻这些“相去甚远、各自一方的东西突然聚拢到一起,写出种种不般配的事来”。<sup>②</sup> 美国人失望地窥见了日本移民群体精神上的极端功利与贫乏。“神国日本”这一“金玉其外”的炫目果实被剥开后,得到的是“败絮其中”的种子。东乡“为返回日本而来”的宣示看似无厘头的废话,实则以隐喻的方式提示着日本移民不变的“他者”身份,以及注定无法与美国文明社会相容的命运,种族主义者由于从东乡的言行中寻觅到了“排日”理由而满足了“仇日”心理。但即便如此,日本学童仍能赢得超越种族界限的喜爱,其原因需要从东乡人格设定的另一侧面去寻找。

## 二、孩童化人格:幻灭之下的心理调适

20世纪初美国白人社会的“仇日”现象有着两个不同层面的动因,一是认为日本移民同白人社会间的种族界限、文化鸿沟无法弥合而产生的“厌日”情绪,二是由于担忧日本国运勃兴危及白人霸权而产生的“恐日”心理。两者的叠加使得日本移民的积极同化意向不仅无助于赢得白人社会的信任与接纳,反而易被视为颠覆和渗透的危险企图。日本移民对美国宗教的“工具化”认知,只会令主流社会认为他们热衷入教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羽翼丰满即会撕下伪装,暴露异教徒的本来面目。

在被英属加拿大的白人打掉两颗门牙后,东乡的表兄弟乃木愤恨地表示:“日本不需要传教士了,我国已拥有装备速射炮的舰队和常备军,这足以让所有日本人成为基督徒。”<sup>③</sup>在乃木看来,“基督徒”与“文明人”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语,如若不能以和平同化方式赢得“文明人”身份,就不妨采用和日俄战争同样的手段去争取。“东乡”与“乃木”的人物命名,正体现了日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战争恐惧感。1908年,一部名为《万岁!》的战争题材假想小说应时而生,在书中,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率领日本舰队以浓雾为掩护抵近加州海岸,5000名日侨与之里应外合,轻取旧金山市,随后,东乡舰队又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附近全歼美太平洋舰队。日本陆军则在乃木希典的指挥下大举登陆,与美军主力会战于俄勒冈州东部的蓝山地区。<sup>④</sup> 日俄战争的胜利,使西方震惊于日本的作战能

<sup>①</sup>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Abstract of the Report on Japanese and other Immigrant Races in the Pacific Coast and Rocky Mountain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 61.

<sup>②</sup> [苏联]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70页。

<sup>③</sup> Wallace Irwin, *Letters of a Japanese Schoolboy*, pp. 11-12.

<sup>④</sup> 《万岁!》作者以“备战”(Parabellum)为笔名,真实身份为德国作家格劳托弗(Ferdinand Heinrich Grautoff)。该书疑为德国对美宣传战计划的一部分,意在进一步激化美国的“仇日”心理,转移一战前美国社会对英德之争的关注。见 *Parabellum, Banzai*, New York: The Trow Press, 1908.

力,“圣将”东乡和“军神”乃木的名号经由日本宣传机器的吹捧,为白人世界所熟知,此时已成为日本军事威胁的代名词。

考虑到切实存在的“日本威胁”国际政治背景,作者如果对东乡桥村进行妖魔化,绝不会令批评者感到意外。但沿着作者在不同时段的写作脉络分析,不难发现东乡形象所传递出的“威胁”意象不仅没有增强,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衰减趋势。东乡藉旧金山种族骚乱的新闻热点粉墨登场,可以说,没有种族骚乱这一时事背景,就无法成就东乡的小丑角色。但从东乡的第四封信开始,种族冲突敏感话题就不再被提及;而在《全能女仆东乡先生》和《家务专家东乡桥村》收录的后续作品中,几乎每封信件都围绕一次失败的打工经历展开叙事,东乡的活动空间亦大体局限于美国雇主的家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宏大话题上的发言权都被剥夺殆尽。

解释这一现象,不能不考虑“东乡桥村”系列作为大众文学作品的市场属性,即其在连载过程中必须根据文本消费者心理需求而调整生产策略。日本由仙乡幻境到洪水猛兽的转变无疑过于迅速,以至于美国社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迷日”风潮尚未退潮,“日本威胁”即席卷而至,幻灭感与恐惧感构成了挫折情绪的两个层面。对此,大众文学作品需要有针对性地担负起消解恐惧心理、治愈幻灭情绪的心理调适功能,二者的同时实现,主要通过对东乡的形象设定来完成。东乡一方面自命为“武士”,<sup>①</sup>另一方面却对强加给他的“女仆”身份毫无抗议地接受。<sup>②</sup>在遭遇白人欺侮时,他通常像决死突击的日军一样高呼“万岁”或“剖腹”,<sup>③</sup>实际上全无还手的胆量,除非对手是比他还要瘦弱的华人厨子。<sup>④</sup>东乡无怨无悔地“享受”(enjoy)着白人带给他的一切身心痛苦,致使公众舆论中可怖的“黄祸”已被戏剧性地弱化为徒有其名、令人耻笑的微不足道存在。如果说以东乡平八郎之名为象征的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已成为白人心目中的噩梦,那么,将此“东乡”与彼“东乡”代表的日本强大军事机器进行切割,无疑可最大化地消除恐惧。

在东乡的个性化语言中,最引人注目亦最令人费解的现象是,美国人仅在严肃交际场合用于对方姓名前的敬称(honorary title)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其使用的对象包括婴儿(Hon. Baby)、苍蝇(Hon. Fly),甚至无生命的物品如吸尘器(Hon. Vacuum)、锅炉(Hon. Furnace)、洗碗布(Hon. Dishrag)等。东乡对一切事物不加区别滥用敬称的“拟人化”做法,其结果是造成了无处不在的“童话式”叙事风格。例如,东乡这样描述吸尘器的工作过程:

想要使用他,需要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把吸尘器君<sup>⑤</sup>的尾巴钉到墙上的插座。
2. 按下开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3. 你会听到一声响动,就像猫儿被冬季鬼天气的旋风冻得哀叫。每当听到它,孤独的诗意都会油然而生。
4. 吸尘器君开始不安地乱动,这说明他想要吃灰了。
5. 找到灰尘,把吸尘器君领到那里,说“咬他”!哼!只要是吸尘器君在觅食的地方,灰尘君再也跑不掉了。<sup>⑥</sup>

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童话式话语,恰当地诠释了东乡的“孩童化”人格。新渡户稻造在对日本宗

①② Wallace Irwin, *Hashimura Togo: Domestic Scientist*, p. 27, 42, 8, 26.

③④ Wallace Irwin, *Letters of a Japanese Schoolboy*, p. 8, 15, 20.

⑤ 敬称 Hon. 多翻译成“阁下”,本文考虑到东乡桥村的日侨身份,视情况译为“阁下”或“君”。

⑥ Wallace Irwin, *Mr. Togo: Maid of all Work*, New York: Duffield & Company, 1913, pp. 4-5.

教文化结构的分析中指出,神道教作为最古老原始的日本宗教信仰,具有“孩童般的幼稚”和“极端的未成熟性”,其内在伦理与教义上的贫乏分别由儒佛两教来填补,自身主要担负公共仪式性的功能。<sup>①</sup>由此,神道文化成为日本最具外显性的文化元素,在西方观察者的视野中先入为主的“日本印象”也必然以神道文化元素为显著标志。小泉八云发现,神道教“万物有灵”的观念从《古事记》时代的神话文本中贯注至今,并深刻影响着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万物有灵说(animism)的发展,使从前的日本人真的认为自己处在灵与恶魔的世界当中……一切可见的运动,波生浪涌,风吹草动,雾走云飞,莫不有灵。”<sup>②</sup>

日本民族在宗教观念上的原始性,在20世纪初西方知识界的认知视阈下极易被视为国民心理年龄尚处于低幼阶段的证据。弗洛伊德就曾试图建立人类宇宙观的发展过程和个体里比多发展不同阶段间的类比联系,认为万物有灵论在年代和内容上与幼儿的自恋期相对应,而科学阶段相当于个体成熟阶段。<sup>③</sup>西方眼中天真未开的日本国民在殖民化背景下的全球文化生产分工体系中,被赋予了“童话生产者”的角色,众多西方作者整理的日本童话与怪谈文学,此时成为欧美文化市场上颇受欢迎的产品,强化了有别于其他亚洲国家的独特“日本印象”。关于日本事物的书写,亦必须服务于怀旧的心理需求。正如乔治·诺克斯所说:“如果用我们的日常语言去讲述日本童话,西方观光客是不乐意看到的,也不希望日本被描述成我们平庸世界的一部分。”<sup>④</sup>

由此出发,就不难理解东乡形象中对立统一的矛盾性。东乡既代表着现实中盲目追随西方文明而精神上日趋平庸的日本,也寄托着“观光客”对日本业已失落的心理期待;既有工商业主的功利,又不乏儿童的朴拙率真;既有口无心地接受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又无时无刻不流露出神道文化的万物有灵观念。欧文并未去过日本,对于日本语言和文化亦只有道听途说的了解。他的创作思路事实上源自西方观察者笔下原初而质朴的日本风情,并以此为模板建构了仅仅存在于其想象中的、被刻意孩童化的日本国民形象。

东乡的矛盾形象设定,体现了同时期西方文化界在日本文明观照问题上的“负罪”心态,即将前现代日本的人文情趣和社会道德水准无限理想化,认为近代日本的一切堕落现象都是遭受西方文明毒害的结果,为此,西方甚至存在向日本“谢罪”的必要。英国画家丁道尔声称,日本乡村未受到西方文明污染时,处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状态,售卖草鞋的摊位即使无人看管,买家都能自觉投币,货品从无丢失。<sup>⑤</sup>更有作者一厢情愿地认为,欧洲人来到日本之前,日本以农立国,没有富人,日本民族是一个思虑单纯、讲道德的民族。文明不仅毁灭了日本的大部分艺术,而且应当对日本的一切道德滑坡负责。<sup>⑥</sup>美国牧师西德尼·古里克将白人的殖民扩张称为引发日俄战争的“白祸”,堪称“谢罪”思潮中的最为极端者。<sup>⑦</sup>

在“负罪”心态的支配下,东乡行为上的功利和精神上的贫乏都可归咎为西方文明环境下“近墨者黑”的结果,得到了合理的开脱,而他与美国雇主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亦往往是由于“童言无

① Inazo Nitobe, *The Japanese N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12, p. 138.

② Lafcadio Hearn, *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4, p. 146.

③ [奥]弗洛伊德著,王献华、张敦福译:《论宗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94页。皮亚杰进一步发展了弗氏的理论,指出幼儿的“万物有灵论”起源于不能区分心理的和物理的东西,因而认为运动中的物体都是有生命和意识的,风知道它自己的吹动,太阳知道它自己的运转等。见[瑞士]J.皮亚杰、B.英海尔德著,吴福元译:《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3页。

④ George William Knox, *Imperial Japan: The Country & Its People*, London: George Newnes Limited, 1905, p. 2.

⑤ Walter Tyndale, *Japan and the Japanese*, New York: MacMillan, 1910, pp. 213-214.

⑥ George H. Rittner, *Impressions of Japan*, New York: James Pott & Co., 1904, pp. 140-141.

⑦ Sydney L. Gulick, *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5, p. 5.

忌”的孩童心性无法理解虚伪做作的成人机心所致。雇主斯皮格特先生曲意逢迎一对富商夫妇，请他们来做客，背地里却和妻子百般发泄对客人的不满，诅咒说恨不得在他们的饭菜中下毒。东乡听到后信以为真，连忙警告富商夫妇速速离开，宾主因此翻脸，东乡却自以为救了客人的性命。<sup>①</sup>天真与心机、淳朴与虚饰一旦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背景下交会，就会上演价值扭曲、善恶易位的闹剧。值得嘲弄和鞭挞的对象并非不通世事的东乡，而是导致人性异化的文明弊病。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观照具有时空二重性，异域想象在另一意义上也是理性的“当下”对非理性“既往”的追溯，是对文明童年时代的怀恋。不知奸谋机心为何物的孩童化人格美德不仅被人人为地赋予前现代日本国民，也出现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追忆当中。在丹尼尔·笛福的著名诗歌《真正的英国人》中，英国先民被浪漫化地想象为从撒克逊人身上继承了诚实精神、与阴谋诡计无缘的民族：“暗室密谋，彼之所短/其性所致，知无不言/其心不坚，议而无断/古有学者，所言不妄/英人谋反，永无胜算/彼心固诚，坦荡无私/故其所虑，无人不知。”<sup>②</sup>

欧文则以喜剧化的荒诞方式来表现东乡的“知无不言”。在一封信件中，东乡不打自招地称自己是“一名日本间谍”。<sup>③</sup>其后更声称自己“每周从乃木那里领到1美元，这是协助他从事间谍活动的报酬”。<sup>④</sup>排日浪潮中的美国媒体不厌其烦地宣称日本移民大多负有刺探美国情报的使命。日本游客在哈德逊河畔拍照留念，即被当地报纸指为涉嫌间谍活动，引起轩然大波。<sup>⑤</sup>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间谍活动”，东乡完全停留在浑浑噩噩的懵懂状态，他将个人的行迹坦白到完全不设防的程度，与美国媒体的如临大敌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彻底颠覆了日本移民性情沉默内向、心理难以捉摸的异类媒体形象。

从日本开国至二战结束的近百年期间，西方对日本的观照经历了由感性迷恋到理性分析的认识深化过程。20世纪初的幻灭期则是连接浪漫与现实、向往与敌视的短暂过渡阶段，移民群体的到来，将真实的日本骤然呈现于美国社会面前，使19世纪的东方异域想象再无栖身之地，抵御这一冲击的心理应激机制也由此在美国社会生成。东乡桥村的孩童化形象，恰好与白人社会的心理应激范式达成了共识。

洛杉矶的一位牧师在1915年的布道中称：“成年人不能对婴儿动手，因为强弱太过悬殊。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娃娃……让娃娃进来，给他一个甜饼，用糖果征服他。”<sup>⑥</sup>在“排日”还是“容日”的问题上，美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严重分歧，“排日”言论多出自新闻界报人之口，早年拥有赴日传教经历的宗教人士则沉溺于旧日本的残缺影像中不能自拔，成为“容日”宣传的中坚力量。相比之下，市民社会虽对日本了解甚微，容易受到排日舆论的左右，但却慑于现代战争在欧洲造成的巨大破坏力，不愿承受同日本开战的代价。在民意总体反对美国参加一战的大背景下，好勇斗狠的武士道日本由于同中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愿景发生冲突，而遭到选择性忽略；唯有闯入成人世界的“儿童”角色得以在排日喧嚣中逆势而上，一跃成为白人社会的宠儿。

一方面，“孩童化”的日本人切合西方知识阶层的传统异域想象，意味着幻灭心理的纾解和美好往昔的重现，使现代文明人在东乡这位天真无邪的“他者”身上寻回了失落已久的“自身”。另一方面，“孩童化”即是“无害化”的同义语，消除了一切构成现实威胁的可能性，市民社会的恐日情

① Wallace Irwin, *Hashimura Togo: Domestic Scientist*, p. 39.

② Daniel Defoe, "The True-Born Englishman: A Satire", in Daniel Defoe, *The Novels and Miscellaneous Works of Daniel De Fo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88, p. 444.

③④ Wallace Irwin, *Letters of a Japanese Schoolboy*, p. 191, 300.

⑤ Sydney L. Gulick, *Anti-Japanese War-scare Storie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7, p. 38.

⑥ Montaville Flowers, *The Japanese Conquest of American Opinion*, New York: George P. Doran, 1917, p. 162.

绪暂时得到了缓释。看似愚不可及的日本学童实际上成功寻觅到了迎合多重心理期待的最佳切入点。

### 三、中国或日本：幻灭背后的隐秘政治逻辑

在“幻灭期”之初，日本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尚可谓褒多于贬，“排日”倾向仅局限于西海岸地区，并未成为主流，这使得欧文敢于通过恶作剧式的行为艺术方式将自己充分代入“东乡桥村”角色而不至招致非议，<sup>①</sup>主观上继承了欧美书信体小说借异邦访问者之口立言的传统，曲折表达作者本人的政见诉求，客观上则起到为日本侨民发声代言的作用。此时的欧文仍期望“幻灭期”残存的旧日本异域想象能够谋求与现代文明的妥协，发挥弥合冲突的功能。1907年12月，16艘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组成的“大白舰队”从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海军基地出发，于次年5月6日抵达旧金山休整，准备开始美国海军史上最著名的环球航行之旅。舰队将日本作为重点访问的国家，“炮舰外交”的威慑作用不言而喻。

在美日军事对抗风险骤然升级之际，欧文笔下的东乡表现出空前的焦虑感。获知舰队将相继访问日本和中国后，东乡以一贯的撒娇口吻向周刊编辑提出了异想天开的要求：

您可否致信梅特卡夫<sup>②</sup>阁下，劝说他不要让舰队访问中国？美国海军见到日本之后，就不会稀罕中国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妙趣天成的国家，大河小溪里流着热水和冷水，不光景色如画，还有现代的进步产品。美国游客可以搭乘通宵服务的电梯，登上古怪的(anteek)<sup>③</sup>奈良大寺最高处，只要2美分的小费就够了。艺妓伴着爱迪生留声机的音乐，跳着奇异的(quaint)舞蹈。人力车装上了烧煤油的马达，速度可观。日本是清洁无菌的岛国，处处都是艺术，美国水兵会喜欢这里的，他们可以买到廉价的纪念品，然后愉快地说再见。尊敬的美国，不要和东乡打仗！<sup>④</sup>

舆论预想中的剑拔弩张并未成为现实。日本舰队在东乡平八郎的率领下，以最高规格礼节恭迎“大白舰队”。两国海军将士相谈甚欢，“圣将”东乡在欢宴中亦全无威仪，任由半醉的美国水兵放肆地将自己抛起。无论是现实中“东乡”的折节奉承，还是作家笔下另一位“东乡”的献媚争宠，都不约而同地暗示着日本对国家形象危机的深刻隐忧。“古怪”与“奇异”本是用来描述19世纪浪漫日本想象的经典用语，但在日本羽翼渐丰，足以对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利益构成威胁之际，来日无多的残存幻象已是明治日本取悦西方的最后资本，西方一旦在日本之外寻觅到替代性的异域想象来源，将是日本不能承受之重。

美国历史学家伊罗生(Harold Isaacs)指出，近代以来的中日两国从未同时赢得过西方的青睐和尊敬，中国被蔑视的时代，日本必然受宠，反之亦然，这一隐秘政治逻辑直至二战后仍在延续。在

<sup>①</sup> 在《科利尔》周刊登载前几封署名“东乡桥村”的信件后，读者就该信是否真为日本侨民所写展开热议。不久，《科利尔》刊出了一张据称由“东乡桥村”本人寄来的签名照(签名中“东乡”为汉字，“桥村”为片假名)，照片中可见一位留着八字胡须的“亚洲男子”站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画像前面，摆出与总统相同的姿势，照片背面用东乡惯用的蹩脚英文写道：“我十分仰慕美国皇帝陛下。”该照片与一封题为《黄祸》的来信一起发表，令人不由深信作者真的是一位替自身“讨说法”的日本侨民。直到1908年5月，《科利尔》才公布了事情的真相，原来照片中的男子正是欧文本人，黄色颜料、假胡须和高明的化妆术使他骗过了读者的眼睛。这一噱头也显著地提升了欧文及其作品的知名度。

<sup>②</sup> 维克多·梅特卡夫(Victor H. Metcalf, 1853-1936)，美国共和党政治家，时任海军部长。

<sup>③</sup> anteek为antic之误，作者有意在东乡的行文中制造大量的拼写错误。

<sup>④</sup> Wallace Irwin, *Letters of a Japanese Schoolboy*, p. 102.

在他看来,近代西方对中国的“蔑视时代”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5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sup>①</sup>西方观察者于1905年发表的旅日感想,间接证明伊氏揭示的隐秘逻辑并非虚言:“一旦观光客定居日本,他的观感就会发生变化。如画的景色不再引人入胜,新奇感逐渐褪去……而且只要想到日本高山平原的雄奇景色是由一系列地震造成的,就不会再向往它了(越了解地震,这种想法越明显);日本的礼节看起来虚浮伪善,商道更是一无是处。这时他就会宁愿住在中国,或者东西方一切其他国度。”<sup>②</sup>

日本打破国际秩序战争行为引发了西方的“地震”联想,原本被称道不已的日本风情瞬间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此微妙时刻,旧日本异域想象的存续竟已上升到影响美日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地步。同属东方的古老中国一样可能触发浪漫想象,使日本不得专美于前,这是东乡企图阻止美国舰队访华的原因所在。他忙不迭地宣称中国“虽然将祖宗的功德刻石立碑,不过这些圣物几乎无人清洗,以致不可辨认”,与“清洁无菌”的日本无法相提并论。<sup>③</sup>此前近半个世纪期间,西方惯于将中国与日本置于同一标准尺度下进行比照,从未孤立地看待过任何一方。中日互为对方的参照物,分处西方价值评判的天平两端,其形象高下变化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联动特征,东乡的焦虑感事实上源自欧文内心的天平产生的第一丝异动。

同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东乡视华人为大敌,对中国移民不仅毫无团结意愿,反而抱有惊人的嫉恨心理,恨不能去之而后快。<sup>④</sup>凡涉及中日比较的话题,东乡都会不遗余力地宣扬“日本优于中国”的理念,唯恐美国人流露出对中国的好感。甚至在雇主琼斯太太要求他保养家传瓷器时,也会昂然答道:“日本人是瓷器(中国)的优秀监护人。”<sup>⑤</sup>华人中存在的不讲卫生、嗜赌、吸食鸦片等恶习被通过东乡之口无限夸大,说明欧文厚日薄中的立场暂未得到根本扭转。然而,欧文眼中的华人世界并非一团漆黑,他在1906年出版的诗集《唐人街歌谣》中刻画了华人难民邦(Bong)的形象。木讷的邦充分体现了华人重情念旧的传统美德。邦念念不忘白人雇主的识遇收留之恩,在旧金山大地震之际从火中救出雇主的妻儿,给予她们最周到的安置,“你认识我”(You sabe me)是邦对雇主不离不弃的唯一理由。欧文写下了这样的感悟:“你相信排华有理吗/我或许相信过/但那是在大难之前/当城市在震怒中被连根拔起/当死神的烈焰收割着生命/我才看到/比一切排华法案更深入人心/是一个种族的真诚。”<sup>⑥</sup>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主义的丑化想象终究无法掩盖华人忠厚笃信的人文性格,美国社会开始对以往的排华言行进行反思,逐步认识到华人的精神价值,而这无疑使日本移民面临着更严峻的道德竞争。

在东乡所从事的家政服务行业,日侨在同华人的竞争中不久即全面败下阵来。东乡的雇主坦言自己曾多次在报章上读到对日本“女仆”群体的恶评,直到目睹东乡的拙劣表现,方知名不虚传。<sup>⑦</sup>与忠于职守、勤于持家的“邦”们相比,“东乡”们通常不善于料理雇主交付的工作,又耻于自认无能,往往在留下一张字条后不辞而别。<sup>⑧</sup>这种行为令契约社会中的美国人难以理解,进一步加深了日本人不信守合同的印象。<sup>⑨</sup>日本旅美作家河上清于1914年强辩称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适合做佣人,并不能说明日本人素质低劣,因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不知疲倦”的民族本来就当

① Harold Robert Iss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John Day, 1958, p. 71.

② George William Knox, *Imperial Japan: The Country & Its People*, pp. 2 - 3.

③④ Wallace Irwin, *Letters of a Japanese Schoolboy*, p. 103, 21.

⑤⑧ Wallace Irwin, *Mr. Togo: Maid of all Work*, p. 64, 11.

⑥ Wallace Irwin, *Chinatown Ballads*, New York: Duffield & Company, 1906, p. 35.

⑦ Wallace Irwin, *Hashimura Togo: Domestic Scientist*, p. 64.

⑨ Jesse Frederick Steiner, *The Japanese Inva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Inter-Racial Contacts*, Chicago: A. C. McClurg & Co., 1917, p. 116.

不了好的佣人。<sup>①</sup> 不过,相关调查报告很快即证实日本移民在其他行业的口碑同样难与华人比肩。美国移民局对日籍劳工的表现作出了如下评价:“他们通常不遵守工作合同,沉迷赌博酗酒,如果被成批地雇用,干活就干得很不老实。雇用日本人只是因为中国人赚足了钱,越来越难雇到。”<sup>②</sup> 现实中日本移民口是心非、心机深重的公众舆论形象日趋固化,已与欧文笔下孩童化的东乡渐行渐远。通过文学手段对异域想象进行救赎的努力只能行于一时,长远来讲,大众文学作家向社会主流认知取向低头只是时间问题。

1919年,欧文受《星期六晚邮报》委派前往加州日侨聚居区进行“考察”,并于1921年出版了小说《太阳的种子》。作为与报界联系紧密的专栏作家,欧文深知美国媒体愈演愈烈的排日舆论导向,《太阳的种子》也堪称不负媒体期望的“考察成果”。书中的女主角安娜·布莱是一位薄有田产的年轻寡妇,儿时的旅日经历使她原本对日本极具好感。在父亲的“日本老友”田积男爵(Baron Tazumi)花言巧语的诱骗下,安娜的农场最终被日本在加州的开拓团霸占一空,富于象征意义地完成了美国人对日“幻灭”的过程。曾在“东乡桥村”系列中发挥重要心理调适功能的“孩童化”手段,到了《太阳的种子》中已不复存在,牵在“黄皮肤孩子”手中的、有着“紫色蝙蝠翅膀、恶魔面容、五彩斑斓身体的风筝,给丑陋平凡的环境增添了浪漫色彩”。<sup>③</sup> 作为异域浪漫事物的“日本风筝”意象在书中反复出现,但随着时间和场所的变更,此时的“浪漫”毋宁说是神秘与邪恶的结合体,失去了令人向往的价值,即使孩童的存在也不能削弱它的威胁。安娜在日侨定居点目睹的唯一一位足以满足西方传统异域想象的女孩,有着美国人无法想象的纤细形貌,即使穿着西洋服饰,也“如同一尊明代瓷像”般典雅精致,然而这位仙子最终证实是一名朝鲜少女,并且和她的祖国分担着相似的命运,受到粗俗蠢笨的日本妇人无处不在的监视。<sup>④</sup> 东乡担心西方“移情别恋”的隐忧,至此逐渐由噩梦变成现实,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开始取代日本,成为新的异域想象源头。

同期出版的备忘录指出,日本的国际声望在1920年前后已由先前的捧多骂少滑落至毁誉参半的局面。<sup>⑤</sup> 美国人对中日的关注度在这一时间点后亦渐呈易位之势,1919—1941年的《纽约时报》约8万篇文章提到日本,与此同期涉及日本国内政治、社会和日美关系的期刊文章为2897篇,但这一数字已略少于涉华论述。<sup>⑥</sup> 华人侦探陈查理自20年代开始逐步取代东乡,成为亚裔种族的代表形象。陈查理与东乡分享着人文性格、身体形象、语言特征上的诸多共性(乐观开朗、习于忍耐、身材矮小而不具攻击性、对白人女性无欲求、缺乏男性魅力、口语中的大量冗余用词等)。然而,中日移民族群对二者的反馈存在明显差别,华人移民此时已渡过了最艰难的大规模排华时期,地位有所改善,民族意识初步觉醒,因此不难释读出陈查理形象背后隐藏的白人霸权;而在日本移民那里,则正如宇泽美子所说:“无论对东乡的印象有多么偏离现实,在美日本人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动地接受他;相反的是,东乡的出现为日本人创造了众多机遇,对于这些机遇,日本人抱以热望,为之欣喜,从中获利,并且求取不已。”<sup>⑦</sup>

“幻灭期”背景下的日本移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他们为挽救摇摇欲坠的西方对日异域想象,迫切希望与安全无害的“日本学童”之间建立身份上的认同,以期摆脱“入侵者”或“间谍”等污

① Kiyoshi K. Kawakami, *Asia at Door, A Study of the Japanese Question in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Hawaii and Canada*, London and Edinburgh: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4, p. 142.

② H. A. Millis, *The Japanese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15, p. 42.

③④ Wallace Irwin, *Seed of the Sun*,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1, p. 10, 93.

⑤ George Gleason, *What Shall I Think of Japan*, New York: MacMillan, 1921, p. 7.

⑥ Jon Thares Davidann, *Cultural Diplomacy in U. S. - Japanese Relations, 1919 - 1941*, New York: MacMillan, 2007, p. 12.

⑦ Yoshiko Uzawa, “‘Will White Man and Yellow Man Ever Mix?’: Wallace Irwin, Hashimura Togo, and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America”,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7 (2006).

名化的指控,为此不惜一并吞下被戏侮的苦果。在东乡带来的短暂缓释效果消失后,日本官民各界仍通过公共外交途径积极开展对美宣传攻势,企图留住西方心目中的美好日本。这一努力在 30 年代后期最终失败,日美关系也随之滑向了敌对的深渊。日本异域想象的瓦解,客观上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构提供了契机。

中日两国当前都把国家形象的塑造视为重要的外交战略任务。战后日本始终致力于重建欧美的对日异域想象,安倍晋三首相在 2007 年第一次组阁期间即推出以“迈向美丽之国”为名的施政纲领,在“美丽日本”政治语境下争取西方世界的认同;未来的中国也将在“美丽中国”目标指引下,致力于营造清洁、优美、宜居的国家形象,增进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中国如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积极寻求建立在全人类共识基础上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破解西方价值评判体系一家独大的局面,或可规避中日国家形象长期围绕西方“隐秘政治逻辑”展开零和博弈的命运,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想化共存。

**Abstract** In almost a hundred years between the mid-1800s and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image of Japan in the minds of the West underwent drastic changes. The illusion of perfect “oriental paradise” written by Western observers in modern times began to collaps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giving way to negative cognition of Japan as a nation and state, which completely worsened Japan’s image in the end. This some 20 years’ period is known as the “Disillusion Era” of exotic imagination about Japan in the Wes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merican popular writer Wallace Irwin published a series well known as “Hashimura Togo”, depicting the experience of a “Japanese schoolboy” by the name of “Hashimura Togo” studying in the US. The image of “Hashimura Togo” reflected, in some way,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immigrants in the US, but also the subjective efforts made by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n the US to redeem the exotic imagination about Japan. The appearance of “Hashimura Togo” revealed from one side the zero-sum contest in imag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West in modern times. As a result, understanding and mitigating this “secret political logic” based on Western valu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build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as a nation and state in the new era.

(张小龙,副教授,海军航空大学,烟台,264000)

[责任编辑:于红]